

# 当代哲学思潮

## 的比较研究

[美]罗伯特·S·科恩著 陈尚清 范岱年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

辩证唯物论与卡尔纳普的逻辑经验论

〔美〕罗伯特·S·科恩 著

陈荷清 范岱年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8

*Robert S. Cohe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CARNAP'S LOGICAL EMPIRICISM

译自 *Paul A Schilpp* 编的  
The Philosophy of Rudolf Carnap,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LaSalle, Ill., 1963. pp.99—158.

当代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

[美]罗伯特·S·科恩 著

陈荷清 范岱年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装

787×1092 1/32开本 印张4.125 千字91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ISBN 7-80050-024-1/B·9 定价：1.10元

## 译 者 前 言

### (一)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罗伯特·索恩·科恩 (Robert Sonné Cohen) 的这篇论文《辩证唯物论与卡尔纳普的逻辑经验论》，发表在1963年出版的《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udolf Carnap)这一纪念文集上。据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M·瓦托夫斯基在80年代初所作的评价，这篇论文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关辩证唯物论与当代其他哲学纲领的比较研究。”<sup>①</sup>众所周知，本世纪以来，以辩证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已指导俄国、中国等一系列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哲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和人类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在西方科学哲学界，直到本世纪60年代，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它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

<sup>①</sup> Marx W. Wartofsky, Marx Among the Philosophers, 戴 The Left Academy, B. Ollman and E. Vernoff 编, McGraw-Hill, New York, 1982.

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当代的两大哲学思潮。对这两大哲学思潮进行比较研究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科恩的这篇论文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罗伯特·科恩于1923年2月1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是美籍犹太人。1943年获康涅狄格州威斯列扬（Wesleyan）大学理学士学位、耶鲁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并开始担任耶鲁大学物理学讲师。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翌年开始任哲学讲师。随即又担任威斯列扬大学的物理学与哲学助教授。1957年以后任波士顿大学物理学副教授，1959年后任该校哲学与物理学教授，并曾任该校物理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等职，现任该校哲学系主任。科恩早在40年代就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在50年代受到过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写过“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为颇具权威性的美国《科学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撰写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个条目，在这两个条目中，他广征博引，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素养。1964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会的主席。他很早就与流亡来美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P.弗兰克和R.卡尔纳普等相交往，并参加该学派的科学统一学会的活动。1960年他推动成立的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1970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该中心的主席），实际上是科学统一学会

的继续。他是国际闻名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文集》的主编，《维也纳学派文集》的编委。他曾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美国委员会的主席。他曾到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学术访问。罗伯特·科恩既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又与维也纳学派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因此，才有可能对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 (二)

过去，在苏联和我国的哲学界，一般都把逻辑经验论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为它与辩证唯物论是相互敌对的。与此相反，科恩在这篇论文的“导言”中就强调指出，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并不是相互敌对的，它们有基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它们都希望依靠科学和理性，来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

关于人道主义，科恩在一开始就引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引述了H.费格尔的话：“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的箴言”。虽然有些同志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早年思想，不能代表成熟的马克思。但是在成熟的马克思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写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的《致卡内帕》中也重申了这句名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

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sup>①</sup>这些正好体现了科学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精神吗？在当代的一些主要的共产党文献中，我们也看不到否定人道主义的倾向。苏共党纲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真正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sup>②</sup> 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写着：“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所以，不论是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抛弃人道主义的旗帜，都把自己的奋斗纲领共产主义看作是真正的、科学的、彻底的（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而逻辑经验论者也不是只承认人道主义，有的还明确地赞成社会主义。卡尔纳普曾说，维也纳“小组的全体成员对于社会的和政治的进步都非常关心。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是社会主义者。”<sup>③</sup>他还说：“在工业化的世纪里，经济组织和世界组织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各种力量的自由的相互作用’来解决的，而是需要合理的计划。所谓经济组织，是指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谓世界组织，是指逐步向世界政府发展的形式。…它们不过是能使我们最有希望地实现人类最终目的的组织手段。这个最终的目的在于建立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在那里，最受人们重视的是个人的福利和发展，而不是国家的权力。”<sup>④</sup>因此，逻辑经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9页。

② 参阅《苏联共产党纲领》，莫斯科，1986年英文版，第12页。

③ 《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④ 同上书，第135页。

验论者与辩证唯物论者在纲领上并不是相互敌对的，而是比较接近的。

科恩指出：辩证唯物论和逻辑经验论都主张自然主义，都拒绝超自然的说明；它们还都拒绝种种先验的学说。它们两者都要求感官上呈现的证据作为证实经验命题的手段，要求把假说-演绎法和概率推理作为评价证据的方法，要求把实践的活动作为证明的方式。它们都认为人是自然界与社会中的生物，人的本性及其所有方面的演化都是科学的研究的内容，每个人的阶级和文化地位都对他的世界观有所影响。它们主张个人和社会的解放都取决于科学世界观的自由发展和一些相关的物质条件。关于自然主义，列宁曾经评价说：“无论是人本主义原理，无论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表述。”<sup>①</sup>这至少也说明，列宁并不认为自然主义与唯物主义是敌对的，相反，倒是基本一致的。而事实上，辩证唯物论和逻辑经验论都遭到当代宗教神学反科学思潮的反对。

但是，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也有巨大的差异。科恩明确地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出发点不同：辩证唯物论奠基于研究人的冲突的社会理论，所以它强调批判、创造、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逻辑经验论奠基于研究自然秩序的物理理论，所以它强调一致、归纳、静态的和形式的推理。前者注意对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揭露与批判，后者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学精神与技术管理方法的概括与反映。因此，前者对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革命实践有较大的影响，

---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页。

后者则对形式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更大的影响。但二者都是当代思潮极其重要的部分，可以相互补充。

接着，科恩探讨了逻辑实证论的哲学渊源——从贝克莱、休谟到康德和马赫，也探讨了实证论的科学渊源——19世纪的物理学似乎为拒绝科学知识的唯物论解释提供了一种理由，因为热力学全然不需要关于物质特性的任何图象。然后，科恩对实证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唯我论、约定论和哲学原子论——以及与它有联系的现象论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批判，很能给人以启迪。科恩基本上赞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实证论的主观论危险的批判，并把列宁的论点分析为一组循序前进的27个命题，这对我们研究、领会列宁的思想也很有参考价值。

但是，科恩也指出了列宁对实证论批判的不足的地方。如科恩指出：“列宁确信一般的唯心论和特殊的主观论是为反动的社会目的服务的，而唯物论是为进步的目标服务的。不幸，不论是列宁或是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没有提供关于哲学的社会关系史的比较研究。近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表明，这个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他认为，经验论、唯理论、神秘主义等哲学学说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有时进步有时反动）。即使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的哲学，“也有助于鼓励爱因斯坦对正统的物理学作建设性批判，也鼓励了维也纳学派的反神学观点。”而且“马赫他本人是个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科恩的这种主张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对于纠正“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的观点是很有所帮助的。

### (三)

过去，在苏联和我国的哲学界，一般都把逻辑经验论等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证论，而忽视了它在20年代以后向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的转变。

针对上述情况，科恩强调指出：自1925年以来，以石里克、赖欣巴赫、费格尔、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和“物理主义”，已采取了反主观论的态度，而转向经验唯物论，克服了列宁所批判的实证论的主观论倾向。但是长期以来，苏联等国的哲学家们仍把列宁对实证论的批判加之于逻辑经验论。

科恩指出，至少自1925年以来，逻辑经验论已以一种客观论的实在论代替了现象论的实证论。卡尔纳普、亨佩尔、艾耶尔等人已反复地批判过关于意义的实证论标准的贫乏性。继石里克、赖欣巴赫对约定论的批判之后，逻辑经验论者从事了将科学的事实成分与科学的约定成分区分开来的工作。卡尔纳普认为，由于彭加勒对科学理论的约定基础作了令人误解的陈述，又加上别人对他观点的曲解，他被认为是主张约定论的，实际上却是实在论的经验论。格林鲍姆对此又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1928年，当卡尔纳普发表《世界的逻辑构造》时，他仍是一个实证论者，赞成主观论和现象论的经验论。但到了30年代中期，他已转变为物理主义的唯物论的经验论。而科恩归纳的物理主义的头三个命题与1844年马克思的唯物论，与列宁在1908年的唯物论的有关部分是一致的。

关于逻辑经验论者向唯物论（或实在论）的转变，我们认为不能忽视爱因斯坦对他们的影响。石里克、赖欣巴赫、

卡尔纳普等人都是学物理学出身，他们都与爱因斯坦有直接的交往，他们也都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时空观作为他们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案例，他们不能不受到爱因斯坦的反实证论的实在论倾向的影响。例如，卡尔纳普在他的《思想自述》中就回忆了他与爱因斯坦在50年代初期的谈话：“有一次，爱因斯坦对我说，他想对实证主义关于物理世界实在性问题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告诉他，在我们之间对此问题的理解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他批评了那种认为感觉材料是唯一实在的观点，…批评了任何一种假设一切知识有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的观点。我向他解释说，我们已经抛弃了这些早期实证主义的观点，我们也不再相信有所谓‘知识的最根本基础’存在。”<sup>①</sup>这段话也进一步证明了科恩所说卡尔纳普向唯物论经验论转变的事实。

但是，卡尔纳普又提出了“容忍原则”（或译“宽容原则”），认为人们可以选择现象主义的语言，也可以选择物理主义的语言。虽然他明显地倾向于采用后者，因为他说：“物理主义语言的最重要的优点之一，就在于这种语言具有主体间的交流性”<sup>②</sup>但是，正因为他采用了“容忍原则”，不如“党性原则”那么旗帜鲜明，所以既有人表扬他是经验实在论者，也有人批评他是新实证论者。但是，“容忍原则”也有它的好处，即有利于不同学派之间平等地切磋，自由地争鸣，有利于哲学的进步和发展。

---

① 《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59-60页。

② 同上书，第81页。

## (四)

科恩认为，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物理主义）都应进一步研究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应当及时地考虑另一方的不同于自己的那些解答。这些未解决的问题有：（1）主观事件的地位，（2）自然规律的地位，（3）持久实体的地位，（4）关于突现的概念，（5）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语境与内容的关系，（6）形而上学的地位与理性的意义，等等。

此外，关于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是一个有争论的、有待进一步阐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证实真理的标准是革命的实践，“语言是实践的意识”。科恩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思想，但有待进一步澄清。

科恩十分推崇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但认为辩证法应该吸取科学启蒙或逻辑经验论的巨大长处——自我纠正、可检验性、可靠性、全面性和明晰性，把它们应用到社会批判工作上去。但是哲学从来没有整个地为纯科学所同化，它总是保持一颗良心作为核心。所以，除了观察，除了逻辑，哲学仍有一种对人际关系作持久的、历史的、具体的建设性的分析这样的社会功能。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科学哲学界的整体论和历史主义的兴起以及它们对逻辑经验论的批评，促进了逻辑经验论的变化与发展。而历史主义的兴起不能不说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辩证唯物论者也开始改变了对逻辑经验论与形式主义科学哲学观的态度。198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八届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苏联哲学家B.H.萨多夫斯基的“20世纪的科学

哲学：形式主义观与反形式主义观之间的斗争”<sup>①</sup>一文指出形式主义的科学哲学观（只强调形式化、逻辑、数学、公理化方法）和反形式主义的科学哲学观（只强调描述的、非形式的分析、历史观和解释学方法）都有片面性，应该相互补充。他主张形式与描述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一位苏联哲学家E.M.尼克拉萨斯在“方法论研究中的规定与描述”<sup>②</sup>一文中认为，规定主义倾向（以逻辑经验论为代表）往往流行于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时期，描述主义倾向（以历史学派为代表）往往流行于常规科学时期。他也认为二者应该相互补充。这些都表明苏联的哲学家已开始改变过去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观点，而采取了新的比较开放和明智的态度。而罗伯特·科恩可能在促进这种转变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近二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逻辑经验论都有了巨大的变动和发展。科恩已接受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邀请，于1988年秋来华作学术访问，并主讲“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哲学”，他肯定会对这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进行评价。而本书正好作为他讲学的辅助教材。这也是我们赶译本书的原因之一。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附有注释131条。这些注释不但对

---

① 《第八届国际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论文摘要》第3卷，第237—240页。

② 《第八届国际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论文摘要》第4卷 第2部分，第39-40页。

某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系统的索引，而且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必要而充分的说明，值得仔细阅读。

\* \* \*

本书由范岱年译第一章，陈荷清译第二、三、四、五、六章，范岱年校阅了全书。本书篇幅虽然不大，但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涉及古今东、西方许多哲学流派，文字也比较艰涩。科恩本人也曾说这本书是很难翻译的。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限于我们的水平，译文的缺点甚至某些错误仍然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范岱年 陈荷清  
1988年1月11日于北京

## 目 录

|                          |        |
|--------------------------|--------|
| 一、导言.....                | ( 1 )  |
| 二、康德、马赫和实证论.....         | ( 17 ) |
| 三、唯我论、约定论、哲学原子论、现象论..... | ( 24 ) |
| 四、主观论的危险.....            | ( 45 ) |
| 五、经验唯物论.....             | ( 81 ) |
| 六、一致与分歧.....             | ( 99 ) |

# 一、导　　言

## (一)

几年前，著名的逻辑经验论者H. 费格尔 (Herbert Feigl) 写道，“今天对于教育最迫切的事情莫过于一种适用于科学的时代并能起作用的社会哲学了。”他又补充说，“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的箴言。”<sup>1</sup>一个世纪以前，卡尔·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sup>2</sup>尽管

1. Herbert Feigl, “The Scientific Outlook: Naturalism and Humanism”(科学观：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 *American Quarterly* I (1949) 135-148, 重印于Herbert Feigl和May Brodbeck编的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学哲学选读》) (New York 1953), 9, 18.

2. Karl Marx, “Oe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184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 I/3(Berlin, 1932), 114, 英译文见 *The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of Karl Marx*(《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社会哲学》) (London, 1956), 244中T.B. Bottomore的译文。也可参见M. Milligan的完整的译本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oscow and London, 1959), 102. —— 原注。中译文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译者注。

有时时代和环境的距离，有知识和情调的差异，马克思和费格尔在两个基本方面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想要摒弃乌托邦的幻想，因为它对社会可能性的评价是非现实主义的；它们都想要排除超自然主义，因为它的认识主张是诱人地孤僻。他们两位都是科学的人道主义者。

虽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验论却从不同的途径发展了。既然马克思的辩证的自然主义奠基于对社会中的人的研究，那就是奠基于社会理论，而逻辑经验论却主要依赖于对自然秩序的研究，即依赖于物理理论。所以，这并不奇怪，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关于历史的思辨，发展了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念，强调人的事务，而他的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必要条件。这也并不奇怪，马赫 (Mach) 和卡尔纳普 (Carnap)，则发展了休谟的怀疑论的分析，强调了认识的谨慎，而他们的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真正的自然主义的必要条件。

在1848年的革命时代，社会思想家带着不成熟的理论面对着衰落和暴力的形势，他们在概念上的弱点是和社会运动的低效组织相匹配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家能够以几乎没有极限的成功与信心来讨论似乎在认知上与人类事务相隔离的物质。科学的社会理论的应用是极小的；而物理理论的应用已经很熟练和普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经验论思想家的不同目标反映了两种科学资源的鲜明对照，以不同的社会态度比较这种对照是富有启发性的。因此，经验论寻求为给定的世界秩序的平等的和理性的观察者提供一些认识一致的标准。这些观察者组成一个“科学的共和国”；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应该是自由民主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知识是经验论